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战略

——追求文化整合还是文化平衡？

高丙中

人们对现代代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现代化的基本含义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是从甲午战争的沉痛教训之中开始自觉追求这种社会转型的，历经百年沧桑，现代化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未竟之业。中国人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社会转型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一个环节，这种文化建设要达到什么目标呢？从文化性质上给出的答案有民主与科学的文化、三民主义的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建设方式上给出的答案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从理论上说，单一性质的文化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文化建设的方式也是不拘一格的。本文无意详细讨论这些答案，只想现实地探讨一下中国新文化可能追求的目标。

从宏观上看，文化一般有三种存在形态：一元文化的整合形态、多元文化的并存形态和多元文化的平衡形态。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整合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统一的价值尺度，此谓一元文化的整合形态，例如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基督教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当今的北朝鲜社会主义文

化。一种社会文化由多种意识形态支配,这些意识形态为了急取更加有利的社会位置而互相斗争,此谓多元文化的并存形态,这种形态相当普遍,其极端的表现是剧烈的社会震荡,例如前南斯拉夫文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文化。在一个社会的文化领域,多种意识形态先后存在,激烈的冲突并没有造成你死我活的结局,而是和平共处,各得其所,以致相得益彰,此谓多元文化的平衡形态,例如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互补的北欧文化、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互补的新加坡文化。

这三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交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等百家争鸣,相互激发,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给整个社会带来勃勃生机。秦始皇尊崇法家,焚书坑儒;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实施一元文化(法家或儒家)整合的战略。汉代以后,佛传教入,道教兴起,与儒家文化一起并行于世,互争短长(其间不乏杀戮),中国文化又转变为多元并存的形态。儒释道经过长期的争斗和谐调,在唐宋时期终于消除紧张关系,在社会上各得其所,中国文化进入多元平衡的形态。这一形态一直持续到清末,在这期间,基督教文化于明代传入,但是始终未能打破已有的文化平衡,在社会上无足轻重。

中国传统的文化平衡在清末发生转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上逐渐得势,与传统的儒释道发生剧烈的冲突,中国文化又转向多元并存的形态。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传统文化虽然作为生活文化仍是根深蒂固,然而作为意识形态已是江河日下,声名狼藉,可是这时又传入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抗衡。在本世纪40年代末,社会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取代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仍是多元并存的形态。50年代,中国开始大力推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元文化整合。先是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是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因此得以完全确立。再加上“反右”、“社教”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会主义的文化整合已是登峰造极。中国文化又转化为少有的一元整合形态。这种破旧立新的革命手段所造就的文化整合被证明是经不住时代考验的。在1980年前后的几年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民公社解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思想控制放松,中国文化又因震荡而表现为另一种形态。

今日中国社会的文化属于多元文化的并存形态。举其荦荦大者而言,港澳台是资本主义文化、儒家文化、佛教和道教文化并存,大陆是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儒家文化、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并存。港澳台是以资本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大陆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在大陆,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支持靠党政军系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资本主义文化活跃在沿海地区 and 外资及私营企业;儒家文化在部分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上显得比较系统;佛教和道教文化扎根于全国各地,并且特别完整地存在于若干民族之中,如傣族、藏族和土族的佛教文化、苗族和瑶族的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是西北十个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的主要文化,并通过回族深入全国各大中城市。

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并存必然伴随不断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动荡。在最近十几年里,一系列引人注目甚至惊心动魄的事件都是文化冲突的表现。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在1979年和1989年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六四事件”等举国沸腾的震荡。宗教矛盾的激化则引起接二连三的喇嘛造反、穆斯林群众上街游行。在这个时期,文化调适凸现为重要的时代主题。

“文化建设”总是在多元文化并存时期提出来的,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外乎一元文化的整合形态或多元文化的平衡形态,也就是说,它或者追求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或者追求多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平衡。何去何从?我们第一要服从时代的主要目标,第二

要尊重社会事实。

一元文化的整合不能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后发外生型的,在此之前已有现代化的列强,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压力迫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确实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化,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文资本主义为参照的,那么,接受、容纳、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既包括现代因素对传统因素的冲击,也包括现代因素借助传统因素获得生长点和发育机制,有时两者是取代关系,有时两者是共生关系。中国既存的文化有千百年积累的儒释道文化,有在区域范围内举足轻重的伊斯兰文化,还有近几十年主导一切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旧两种传统中既有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也是促进现代化的力量的源泉,那么,它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是基本的文化资源。因此,从理论上说,一元文化(无论是哪一元)不可能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一元文化的整合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分化事实南辕北辙。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当一个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或具有绝对优势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这个阶级可以推行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整合,在完成对其他阶级的消灭、改造之前,它不可能达到一元文化的整合,因为其他阶级不可能洗刷尽自己的思想文化,最多只能隐蔽一时,乔装一番,只要有机会,它们必然起而抗争。如果没有哪个阶级能够支配整个社会,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够推动一元文化的整合。伴随现代化、社会群体不断发生分化,阶级内部的差异不断扩大,而阶级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结果原来的阶级划分变得面目全非,人们的阶级认同也发生分化。社会的多数或支配力量不再是一个阶级,在这个阶段也就没有哪个阶级能够成功地推行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整合。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应该是有助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平衡。现代化最初是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可是,在本世纪已经

成为世界潮流,是超意识形态的。尽管如此,有利于现代化的文化支持却是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助于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达到社会公平。如果二者有一个合理的张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步就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祉。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与社会分层相适应的文化平衡。中国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认同的目标,是国家意志的选择,而限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使命。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有待于全民族的动员,而限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努力。毫无疑问,现阶段的中国有整个社会共享的文化,但是不可否认,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文化偏好(例如雅与俗、洋与土),不同的阶级倾向,不同的意识形态(例如佛教与伊斯兰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们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它们所热衷的文化在公共空间中所占的地位应该与它们的社会份量相适应。它们对现代化的贡献是通过它们的文化来实施的,剥夺它们的文化权利也就等于阻断了它们的社会贡献。一个群体(阶层、阶级)的文化垄断公共空间是违背共同体最高利益的。

因此,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应该把建构非意识形态和超意识形态的文化作为达到文化平衡的基础。要在一个社会之内避免多种意识形态同室操戈,必须在它们之间建立充分的共同点。

首先,要扬弃意识形态的泛化,区分思想文化与生活文化。意识形态是思想文化,可以限制在思想领域,可是,当意识形态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把一切都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发型、衣饰都成了意识形态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结果,思想文化彻底浸透了生活文化,人们的生活文化最大限度地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从青年到老年,从沿海到内地,人们对生活文化中所纠结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过滤,逐渐清理,使生活文化又按自己的规律极大地丰富起来。60年代以至文革期

间,如果你的裤脚大一点(喇叭裤)或小一点(健美裤),你的头发长一点(男性)或短一点(女性),就有人以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来指斥你;如果你胆敢学跳迪斯科,正派人(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认为你腐朽至极。到1990年前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不敢穿的服装,舞厅里已经没有人不敢跳的舞步,特别值得回味的是,在大街小巷、公园操场大练健美操、迪斯科的老头、老太太显得那么自在,那么理所当然。泛化在生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收敛起来了。生活文化可以是非意识形态和超意识形态的。一旦生活文化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分开,多种意识形态的共处就有了共同的社会依托,它们的冲突就有可能局限于思想领域,而不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其次,要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解构,使它们成为中性的,成为人类共同的,自然也就是社会所共享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及其结果,是运用这种方式进行文化建设的重大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所专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认这个死理。时至今日,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僵化没落反而持续发展的秘密之一是科学地从宏观上对市场进行预测和调节。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灵活地实用计划经济,我们当然可以解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让市场为我所用,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不久我们的说法就不用这么累赘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如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否也可以如法泡制呢?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句很土俗却很深刻的话:“活人还能给尿憋死?”我们过去坚守意识形态疆界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现在通过解构的方法吸收资本主义文化而避免了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何乐而不为?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纷至沓来,并结成意识形态阵线相互冲突,难免硝烟四起。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对策自然是文

化建设,文化建设不外两途,即文化整合或文化平衡。追求一元文化的整合是一厢情愿的空谈,既不符合转型时期的社会需要,也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追求文化平衡才是实事求是的选择。文化平衡的实现既有赖于多种文化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各得其所,也有赖于共同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成为社会的基础。

引用书目

布莱克,C. E. 1989年 《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

金耀基 1987年 《中国的现代化》,载《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

Rozman, Gilbert, ed. 1982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Webster, Andrew 1984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文化研究的三个超越

陶 钧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热”可谓多矣,而且热度一次比一次高,至80年代到了沸点。80年代末期虽然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但至90年代又开始升温。今天,随着文化的泛化,随着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裂变日益加剧,文化讨论又开始广泛进行。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在跨入21世纪的最后关头,如果缺少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文化价值导向,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令人担心的。然而,瞻前必先顾后,从今往后文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百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